他们，将永载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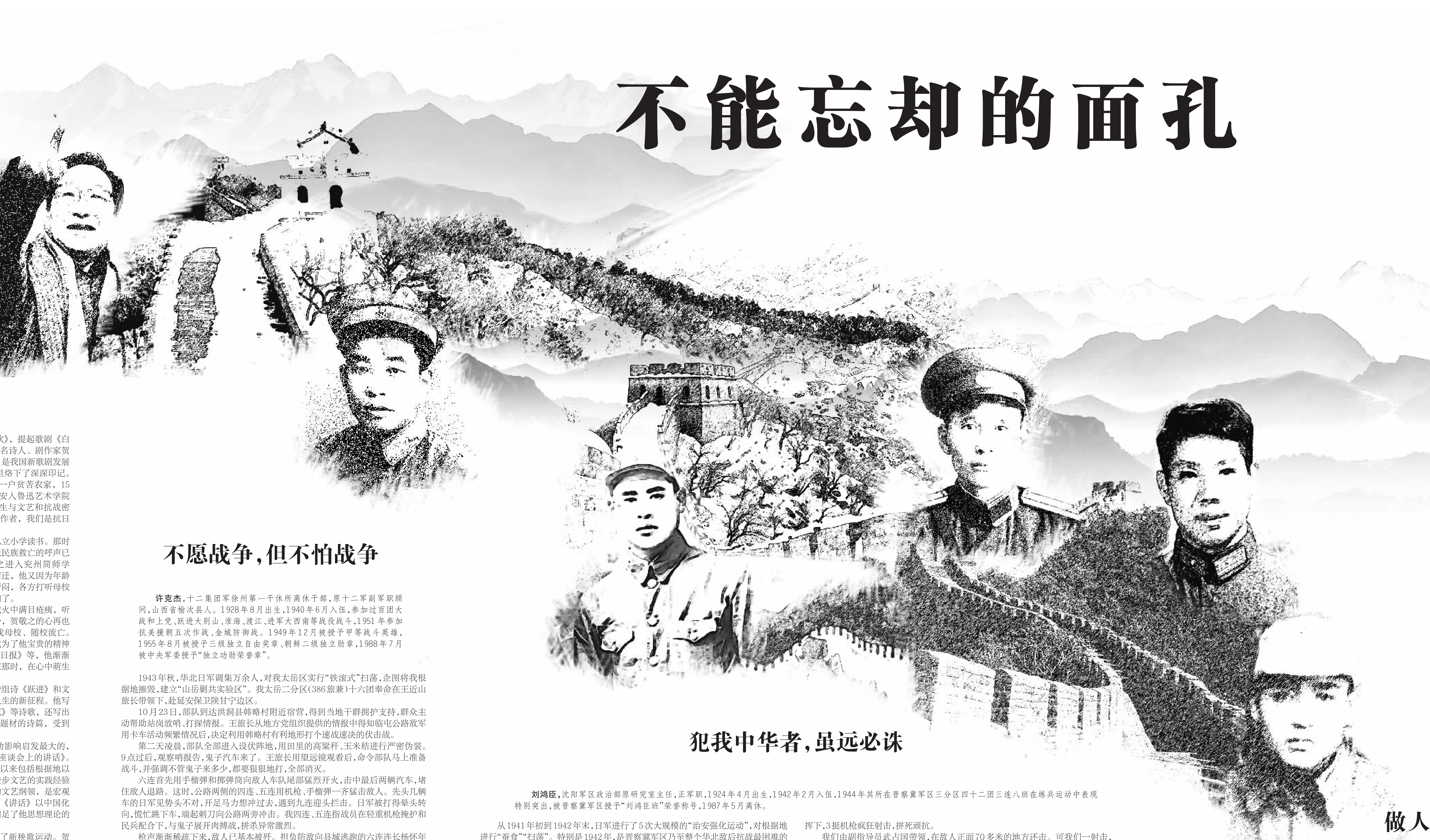
□ 潘泽庆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殊死较量中，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和团结，亿万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关系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抗日斗争中，以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反侵略战争的历史丰碑，以其辉煌的胜利载入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战争史册。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抗日洪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的热潮。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全体中华儿女充分发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先后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并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了对日本侵略者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抗日军民还粉碎了日军一次次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打破了日军的“总力战”。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奋斗的结果，是中华儿女以巨大的牺牲赢得的。一切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作出贡献的人们，都将永载史册！

不能忘却的面孔



我是文艺兵 我是抗日战士

贺敬之，现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1924年生，山东枣庄市峄城区人。15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5年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的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那个飘飘
年来到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我等我爹爹
回家过年

唱起这首家喻户晓的《北风吹》，提起歌剧《白毛女》，人们就会想到我国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他与丁毅合作的这部作品，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也在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烙下了深深印记。1924年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户贫苦农家，15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7岁入党，贺敬之的一生与文艺和抗战密不可分。他曾说，“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

少年时代的贺敬之在北洛村私立小学读书。那时候，抗战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民族救亡的呼声已遍及中华大地。1937年，贺敬之进入兖州简师学习。但不久后，山河破碎，简师南迁，他又因为年龄小被迫退学回家。当他在家万分苦闷，各方打听母校迁移去向的时候，台儿庄战役打响了。

看到原本美丽的山河家园在战火中满目疮痍，听着祖国大地在敌人践踏下痛苦呻吟，贺敬之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毅然出发，开始寻找母校、随校流亡。一路上，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就成为了他宝贵的精神食粮。通过读《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他渐渐了解了长征、了解了鲁艺，也就在那时，在心中萌生了投奔延安的想法。

一路辗转，终到延安。他凭借组诗《跃进》和文艺功底被鲁艺录取，也开启了他人生的新征程。他写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诗歌，还写出了《小兰姑娘》《红灯笼》等农民题材的诗篇，受到大家的喜爱。

但要说当时对贺敬之创作活动影响启发最大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精神是在总结了“五四”以来包括根据地以及苏区乃至国统区等地的革命和进步文艺的实践经验上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纲领，是宏观的社会主义文艺学。贺敬之认为，《讲话》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式，满足了他思想理论的需要。

《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开始了新秧歌运动。贺敬之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从1943年到1944年，贺敬之创作了不少歌词，这其中就包括传唱至今的歌曲《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一支歌穿过抗日的烽火，穿越解放战争的硝烟，把三五九旅的南泥湾精神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上下。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的记忆。

还有一首没有署名，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地地道道陕北民歌的《翻身道情》，也是贺敬之于1943年创作的。歌曲真实而生动地传达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感。通过深入生活，体验情感，贺敬之已经能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他们对新生活的感受。那一时期，他还创作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中型秧歌剧《周子山》等。

从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到歌剧《白毛女》，从《回延安》《桂林山水歌》到《三门峡颂歌》《西去列车的窗口》，贺敬之的每一部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分量。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但在当时成为打动人心、凝聚力量、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在之后的岁月中也以其艺术魅力的沉淀升华，感染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有志中华儿女。

文/金　晶

不愿战争，但不怕战争

许克杰，十二集团军徐州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原十二军副军职顾问，山西省榆次县人。1928年8月出生，1940年6月入伍，参加过百团大战和上党、跃进大别山、淮海、渡江、进军大西南等战役战斗，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五次作战、金城防御战。1949年12月被授予甲等战斗英雄，1955年8月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奖章、朝鲜二级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1943年秋，华北日军调集万余人，对我太岳区实行“铁滚式”扫荡，企图将我根据地摧毁，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我太岳二分区（386旅兼）十六团奉命在王近山旅长带领下，赴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

10月23日，部队到达洪洞县韩略村附近宿营，得到当地干群拥护支持，群众主动帮助站岗放哨、打探情报。王旅长从地方党组织提供的情报中得知临屯公路敌军用卡车活动频繁情况后，决定利用韩略村有利地形打个速战速决的伏击战。

第二天凌晨，部队全部进入设伏阵地，用田里的高粱秆、玉米秸进行严密伪装。9点过后，观察哨报告，鬼子汽车来了。王旅长用望远镜观看后，命令部队马上准备战斗，并强调不管鬼子来多少，都要狠狠地打，全部消灭。

六连首先用手榴弹和掷弹筒向敌人车队尾部猛烈开火，击中最后两辆汽车，堵住敌人退路。这时，公路两侧的四连、五连用机枪、手榴弹一齐猛击敌人。先头几辆车的日军见势头不对，开足马力想冲过去，遇到九连迎头拦击。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慌忙跳下车，端起刺刀向公路两旁冲击。我四连、五连指战员在轻重机枪掩护和民兵配合下，与鬼子展开肉搏战，拼杀异常激烈。

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敌人已基本被歼。担负防敌向县城逃跑的六连连长杨怀年带着一个班仍守在路旁小山包上。他看到战斗将要结束，可自己一枪没放，一个敌人也没有抓到，心里很不自在。这时，突然在距他七八米远的斜坡上冒出5个敌人，其中一个指挥官模样的挥舞着指挥刀，张牙舞爪向小山包扑了上来。正因没打上仗，有气没处使的杨怀年喜出望外，只听他大喊一声，“打!”几个敌人全部被报销了，有具尸体肩章上挂的还是将军军衔。

伏击战持续约3个小时，180多个敌人除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我们缴获92式重机枪1挺，歪把轻机枪2挺，掷弹筒3具，步枪80多支，击毁小车3辆、卡车10辆。我团仅伤亡10多人。当日军纠集重兵，在飞机掩护下前来增援时，王旅长率领部队早已带着战利品迅速转移了。

从缴获文件中得知，这股敌人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组织的“战地观战团”，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五、第六中队和一些军官，内有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有联队长6名，其中还有日本天皇的侄儿。这场韩略伏击战，使日本朝野震惊，被八路军总部称三十六计中“顺手牵羊”的典型战例。

这次战斗，地方党组织密切协同有力配合，战区人民大力支援，王近山旅长从战场实际出发，亲自勘察掌握敌情，利用有利地形，周密部署，战法得当，特别是战斗全程全体指战员勇猛顽强、不怕牺牲，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根据地乃至全国的抗日军民士气，让日军在我太岳地区实行的“铁滚式”扫荡产生严重心理障碍和阻碍。71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它，纪念它，学习它，让我深切感到，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永远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强大法宝。让我感悟更深的是，铭记历史是为了警示未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已69年了，军国主义仍阴魂不散，右翼势力频频制造事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告诫安倍政府和军国主义者，和平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不愿战争，但决不害怕战争，如果有人背离主流，胆敢对我发动战争，我们军队有信心、有能力，只会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许克杰口述　黄建东　周　林整理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刘鸿臣，沈阳军区政治部原研究室主任，正军职，1924年4月出生，1942年2月入伍，1944年其所在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四十二团三连八班在练兵运动中表现特别突出，被晋察冀军区授予“刘鸿臣班”荣誉称号，1987年5月离休。

从1941年初到1942年末，日军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特别是1942年，是晋察冀军区乃至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1000人以上兵力的“扫荡”70多次，其中50000人以上的“扫荡”15次，最后发展到依托铁路、公路交通网络，用碉堡和封锁沟形成“铁壁合围”，加紧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企图在经济上困死我们。我正是在那一年参军入伍的，分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四十二团。

那时候，部队从司令员、团长到普通士兵，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7两粮食，都吃两顿饭，基本都是稀饭，根本吃不饱，就算当时感觉吃得很饱，用不了几个小时，肚子就咕咕叫。在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春夏之交，全靠挖野菜、吃树叶补充。武器弹药也少得可怜，步枪手每人只有5发子弹，机枪手也不过50发子弹，每人4枚手榴弹。

可就在吃不饱、穿不暖，武器弹药奇缺的情况下，我们八路军依然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仅在1943年下半年的一次“反扫荡”中，我们团奉命保卫晋察冀军区机关，大小战斗46次，歼灭敌军800多人，击落敌机1架。

1945年5月15日，晋察冀军区为扩大解放区，准备反攻，召开干部大会，要求主力兵团在预定建立解放区的地方组织战斗。根据任务，我们发起了雁北战役，第三分区部队在定县和曲阳之间的公路上，频繁打击由定县向曲阳运送物资之敌和曲阳出发之敌。

6月8日，我们获悉，9日定县之敌向曲阳运输弹药给养，曲阳之敌沿公路至高门村接应，并准备沿途抢粮。接到情报后，三分区首长决定：四十二团在田家庄、高门间设伏，在运动中歼灭曲阳接应之敌。我连的任务是隐蔽在公路南侧麦田地，依托土堆、坟地等地形，协同主力围歼敌人，并阻敌南逃。

6月9日10时许，敌人全部进入我们事先设好的伏击圈。“突、突、突”，团属重机枪首先打响。敌人在行进中突然遭袭，队形一下子就乱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不分目标开始盲目射击。这时，路南面的伪军爬过封锁沟向南逃窜，连长立即指挥我们截击。二排长王国华率全排迂回至敌人右侧拦敌，当即俘虏日伪军10余人，缴枪40余支。日军在火力夹击下死伤一大部分，残敌龟缩在公路南侧一个护线坑里，在指挥官的指挥下，3挺机枪疯狂射击，拼死顽抗。

我们由副指导员武占国带领，在敌人正面70多米的地方还击。可我们一射击，鬼子就缩到护线坑内；我们一前进，他们马上开火，想投手榴弹，70多米又远得够不到，一时无法接近。此时，其余战斗都已结束，惟有此处残敌还在负隅顽抗。关键时刻，四连投弹能手苏双才过来助阵，连续投了几枚手榴弹，多数在护线坑内爆炸。敌人不得已跳出来逃窜。

“同志们，冲啊!”战机稍纵即逝，副指导员武占国大喊一声。喊毕，几乎和我同时向敌人冲去，与鬼子展开白刃格斗。赶巧，我迎面碰上了日军小队长。他瞪着眼睛，哇哇乱叫，还没容我多想，就举起手中日本战刀向我迎头劈来。我当时用的正是缴获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装上刺刀后近1人高，长出日本战刀一大截。我见刀劈来，便发挥武器优势，拼出全身力气向左一拨儿，“啪”的一声，他的战刀被我挡开，趁着他身体踉跄之时，我顺势弓腰上步、挥臂出枪，一个突刺，正中他的胸膛，他一声惨叫倒地，紧接着我又补了一刀，这个日军指挥官就一命归西，结束了罪恶的生命。

大约12时，除了3个鬼子被活捉外，其余均被击毙或刺死。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我们共歼灭日伪军80多人，俘虏曲阳县伪县长和日伪军38人，缴获轻机枪4挺，掷弹筒2具，步枪85支及其他军用物资。而我个人缴获日本战刀一把、手枪一支、日军腰带一条。

此后，我又随部队进行了几次战斗，明显感觉到鬼子的士气与战斗力已明显不如我刚参军的时候了，用“江河日下”形容并不为过。1945年8月16日早上，我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全团都沸腾了，一片欢呼雀跃，很多战士相互拥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侵我国土者，虽强必杀。战火硝烟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我作为70多年前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深切地感到，凝聚起来的中国力量犹如昆仑和泰山一样伟岸，势似长江和黄河一般壮阔，不论遇到多大灾难、险阻和变故，民族在血浓于水的情感下终归会团结一致，国家在匹夫有责的召唤下终归会和谐统一，社会在共享太平的引领下终归会繁荣富强。

刘鸿臣口述　杜善国　薛宇成整理

做人民的勤务员

姜世恩，1925年9月出生，山东蓬莱人。1942年加入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北海区公安局侦察员、班长、排长，龙口市公安局警卫队队长。1947年1月，调胶东三旅任副连长，后来，部队改编为九纵队二十七师，任炮兵参谋、作战参谋、副营长。1949年，在淮海战役中负重伤（二等伤残）。

1942年，来自山东蓬莱、不到18岁的姜世恩穿上八路军军装，成为一名军人。他参军的目标简单明了：打鬼子！

当年抗战条件十分艰苦，跟随八路军四处征战打鬼子的姜世恩，一心想早日把侵略者赶出家园，作为一名战士，他满怀保卫国家的必胜信念。抗战中，姜世恩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鬼门关。那年，姜世恩跟随部队在山东临朐与日军周旋，部队转战渡河时突遇急流，姜世恩不慎落水，湍急的水流瞬间将他冲走。生命危在旦夕！就在此时，10多名战友勇敢地跳入水中，不顾生命危险搭救姜世恩。幸运的是，他被救了上来，也没有一个战友被河水冲走。上岸后，队伍甚至来不及休整，继续奔赴战场。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姜世恩和战友们欢呼胜利的同时，又面临新的考验。姜世恩又投入了解放战争。

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潍县战役、济南战役等重大战役的姜世恩，在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的时候又经历了第二次鬼门关。1949年1月6日，姜世恩正按作战任务带领一个营攻打撤退中的敌军，他在徐州双堆集侦察后回部队的路上，遭遇敌人伏击，当场中弹。当时，他只觉得后背烫了一下，心里想着赶紧回去报告敌情的他竟没觉得丝毫疼痛。跑回部队汇报完敌情，姜世恩突然觉得疼痛难忍，鲜血也已经浸透衣服。经过及时抢救，姜世恩保住了性命，而击中他的这颗子弹一直到14个月后才取出。因为这颗子弹，他要时常忍受剧痛和吐血的折磨。

1950年5月31日，姜世恩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退休军人证明书》，因为受伤严重、吐血，他光荣退伍，回原籍任黄山乡党委书记，从此开始新的人生历程。

1951年，姜世恩到大连治伤并分配工作，开始了在大连的生活。1975年，姜世恩被调到旅大市碧流河工程指挥部任后勤处处长，碧流河工期时间紧，任务重，每天都要熬夜工作，还要上大坝劳动，没日没夜的忙碌让姜世恩积劳成疾，患上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疾病。工程建好后，姜世恩却累病了，整整卧床8个月。

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里，姜世恩在大连宾馆、大连市政府等单位工作，直至离休。这期间，姜世恩始终担任处长职务，一直没有提升。对此，他心态十分平和。姜世恩说，“革命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老党员，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如今，安度晚年的姜世恩生活简单又有滋有味，养花、养鱼、打门球是他平日里最大的爱好。总有亲戚朋友和他聊起那段战斗生涯，也总有人问他，你为国家付出了那么多，对现在的待遇满意吗？姜世恩说，“比起那些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我能看到新中国成立，能活到90岁，而且各方面待遇都不错，非常知足了！”

文/苏大鹏　赵植萍

读《四世同堂》 看抗战众生相

□ 沈仲亮

一条胡同，50多个人物，市井烟火与时代洪流交缠萦绕，个人的悲喜与文化的痛楚相互映照。这就是老舍笔下的《四世同堂》。他用其一贯的细腻笔触与悲悯情怀，塑造出力透纸背的抗战众生相，并透过这些人物，叙述了一部民族的痛史，凝练成对传统文化的透彻观察。

当文化与战争“同堂”，“四世”不再仅仅标明一个家族的断代，也是在战争的视域里重新观照传统文化的“四重维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深厚且滞重的，当面临剧烈的外界冲突时，有动摇、有觉醒，但同时也有犹疑、有被动。

作为父亲的祁天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是传统的“老中国的儿女”，一辈子委曲求全，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抗战一爆发，他变得不知所措。他可以最大程度地承受生活的磨难和旁人的刁难，但是不能忍受对自己人格的作践。最终，他由于受到日本人的“游街”侮辱而投河自尽。终究，他是为了一口气而活着，而这口气要是没了，他这个人也就无法立于天地间。这口气，联系着的依然是尊严、自重、气节等。只是在祁天佑的话语体系里，他更习惯把它称为“体面”。大哥祁瑞宣也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员，不愿当亡国奴，心痛大好河山被占领，但作为一个大家庭里的长孙，他还要考虑一大家子人的安危和生计。他知道自己没法走出家门，但支持弟弟去抗日，他对弟弟说，“你去尽忠，我来尽孝”，半是激励半是无奈。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着不少投机主义的劣根性，《四世同堂》中，也有着对这一类人的深刻嘲讽与否定。

二哥祁瑞丰贪图享受，一直都想谋个官职当当，为此不惜多方钻营。在这样一个性格支点下，他一步步走上汉奸的道路，也就并不奇怪了。小说中也不乏告密者、为虎作伥者、狐假虎威者，等等。对于这些民族败类的描写，正是老舍力图展现出的复杂而惊心动魄的抗战历程。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都显得极为幼稚。这一场抗战确实是“持久战”，也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洋溢着世俗风情的，但就是这“俗”里，既有蛮荒的恶，又有深厚的仁爱。这也是老舍的作品向来着墨的重点。

在《四世同堂》的抗战群像里，有许多让人动容的小人物：拉洋车的、剃头的、搬运苦力……他们看似三教九流，却有着底层人民的原始强力和最朴素的家国观。他们在乱世里要讨生活，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们的屈服侵略者的理由。即使是方六，一个逗人开心的相声艺人，在天桥挣几个铜子儿时，他还时常把时事材料“现挂”到相声段子里去，激发听众的爱国情怀。

终于，抗战胜利了，小羊圈胡同里的民众忍受了8年的屈辱，似乎在找一个出口宣泄胜利。他们想到的是胡同里还住着一个日本老太婆，他们要去给她点颜色看看。这时，祁瑞宣毫不迟疑地站出来制止，他“猛然站起，一步跨到日本老太婆和大家中间。他的脸煞白，眼睛闪着光。他挺起胸膛，人仿佛忽地拔高了不少。他照平常那样和气，可是态度坚决地问道：‘你们打算干什么？’谁也没敢回答，连方六也没作声。……‘你们打算先揍这个老太婆一顿吗？’”瑞宣的挺身而出，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仁义、善良。他受够了被欺压的苦，不想对一个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种不断循环的互惩模式只会将人类推入更深的灾难之中。

一边是几千年的厚重传统，一边是包括战争在内的新的历史时代的巨大冲击，传统文化如何拾起自信继续前行，是老舍在《四世同堂》里着力探讨的问题，这就是文化的“新生”。

三弟祁瑞全是一个在校大学生，他有理想、有热情，也有行动力。北平一沦陷，他就走出家门，投入到抗战洪流之中。一定意义上讲，祁瑞全象征着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他身上的青春、热血、向上、自信，让人感到振奋，也让人看到民族的希望。

而小说塑造的另一个传统文人钱默吟，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隐喻。战前，钱默吟“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是一个具有十足士大夫情调的时代落伍者。他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似乎永远那么悠闲，不争不抢，不焦不躁。然而，北平一沦陷，他就觉得他的魂没了。他能做的，就是为他的国而振作。钱默吟经历着一场蜕变，他从“隐士”逐渐变成了“勇士”，而这种“士”是可杀不可辱的。他接受的更多精神资源还是儒家文化推崇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突进而变得一文不值，它在新的时代里裹挟着新的内容，进入了钱默吟以及千千万中国有志之士的性格重构和情感逻辑里。正是他们，带领这个古老的国家奋力突围，直至翻开新的历史一页。